

# 清代广东刻书业的演变与地理分布

陈国飞

(广东医科大学, 广东 湛江 524023)

**摘要:** 清代的广东刻书总体上在继承前代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发展。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,清初的广东刻书呈萎靡不振的态势。但到了清代中后期,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,尤其是在学术文化的刺激下,广东刻书的发展突飞猛进。广州的刻书成为这一时期广东刻书的代表。同时广东省内各地的刻书水平参差不齐,但总的来说都有所发展。

**关键词:** 清代; 广东; 刻书

我国的雕版印刷术一般认为起源于唐代,至宋代时已经非常流行,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刻书业。广东地区的刻书业源于何时,还难以确论。但可以肯定的是,广东地区在宋代时已经开始刻书。从现存的两部广东刻印的宋版书——《新刊校定九家集注杜诗》《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》来看,当时广东地区刻印书籍的质量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,本地刻书也在吸收刻书业发达的江浙、福建地区的技术经验的基础上,呈现出独特的风格。元代广东刻书紧随当时的潮流,喜用赵体字,从整体风格来看,已与广东宋版有较大差别。明代广东刻书进入快速发展阶段,以官刻、私刻为代表,留有许多精品传世。同时也形成了几个刻书中心,如广州、潮州等。广东刻书经过从宋代到明代的发展,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技术经验,奠定了清代广东刻书臻于鼎盛的基础。对于清代广东刻书的研究,学界多有涉及。罗志欢对明清广东刻书的质量进行了研究,还对私人刻书及部分书坊的情况进行了整理。李绪柏对清代广东所刻丛书及首刊、校刊、汇刊名著做了系统的梳理。其他对省内各府、各类刻书的专题研究也有了一些成果。但总的来说,这些研究大多专注于某一方面,缺乏对清代广东刻书的总体把握。笔者将就此问题进行阐述,若有不足,望方家赐教。

## 一、清初的广东刻书

清初的广东刻书经历了一次低潮期,刻书数量不多。以丛书为例,据李绪柏统计,广东在康熙至嘉庆时期所刻丛书仅占清代广东所刻丛书总量的11%。这些书绝大部为私刻诗文集,而这一时期的广东刻书也是以私刻为主流。这些私刻书籍有不少精品,如屈大钧的《翁山文存》《翁山文外》和金堡的《遍行堂集》,古风仍存。尤其是邝露的《峤雅》、梁朝钟的《喻园集》皆手写上版,刻工精美。还有王隼的《文苑综雅》、释大汕的《离六堂集》,其雕刻亦非鄙俗。这一时期的医书、佛经的刻印也是较有特色的。

医书有两广运使署在康熙五十年刊印的《景岳全书》、刘渊在乾隆四年刊印的《医学纂要》等11种。佛教书籍仅海幢寺刻印的就有《角虎集》《梵纲经心地品菩萨戒疏义》等12种。但与同时期的刻书发达地区及嘉道以后的本地刻书相比,当时的广东刻书总体上呈现萎靡不振的态势。

清初广东刻书的不佳表现是由当时的社会状况导致的。明清鼎革之际,岭南地区战乱频仍,南明与清军在此展开激烈的争夺。战乱对广东境内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广州、潮州等地造成严重破坏。从顺治十八年起,为了镇压东南沿海的反清力量,清廷又开始厉行“迁海”。康熙元年,科尔坤、介山前往广东,“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,以绝接济台湾之患。于是麾兵折界,期三日尽夷其地,空其人民……明年癸卯,华大人来巡边界,再迁其民。其八月,伊、吕二大人复来巡界。明年甲辰三月,特大人又来巡界”。<sup>57</sup>经过几次强制迁徙,广东沿海一片凋敝,“其丁壮去为兵,老弱辗转沟壑。或合家饮毒,或尽帑投河……自有粤东以来,生灵之祸,莫惨于此。”<sup>58</sup>康熙十二年,三藩之乱发生后,广东地区再次受到战乱波及。空前的社会动荡使广东当地的社会经济元气大伤,到了康熙中期以后,广东地区才迎来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,社会经济得以恢复、发展。但刻书的发展不仅仅与繁荣的经济有关,还与文化氛围有巨大的联系。

自明代陈献章、湛若水以来,广东理学大盛,士子多好讲论性理,流风所及,一直影响到了清初。陈献章的学术思想强调“六经在心中”,他认为“六经,夫子之书也。学者徒诵其言而忘味,六经一糟粕也。”<sup>20</sup>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,士子不重视博览群书,一般的经史典籍和科举制艺之外,无所留心,使得广东刻书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,与刻书兴盛的江浙地区存在明显差距。

## 二、清代中后期——广东刻书的鼎盛时代

清初政局稳定下来以后,广东地区的经济得以快速发展,尤

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,很快崛起为华南地区的经济中心之一。广州作为“会城”,各方面条件得天独厚。乾隆二十二年(1757年),广州被确定为唯一的通商口岸。在发达的外贸的刺激下,广州经济更加繁荣,被称为“金山珠海,天子南库”。具备了优越的经济条件,只要文化条件成熟,广州刻书便会迎来“凤凰涅槃”。嘉庆二十三年(1818年),阮元任两广总督。他在任内(1818-1826)大力提倡朴学,设学海堂以课士,奖掖人才,刻印书籍。广东学术风气为之一变,讲究考据的朴学大为流行,广东刻书之风也从此大盛。

这一期的官刻以学海堂、广雅书局为代表。学海堂创建于道光五年,是一座以钻研朴学为宗旨的学术机构,同时也进行刻书。其所刻书籍有《学海堂集》九十卷、《皇清经解》一千四百卷、《学海堂丛刻》二十八卷、《掇经室集》六十二卷、《国朝岭南文钞》十八卷、《学海堂志》一卷、《学海堂专课章程》《经典释文考证》三十卷、《数学精详》十二卷、《前汉纪》三十卷《后汉纪》三十卷附《两汉纪校记》二卷、《史目表》一卷、《西汉会要》七十卷、《岭南集》八卷、《剑光楼集及词》五卷、《钦定四库全书附存书目》十卷、《三国志裴注述》二卷、《北溪字义》二卷、《南海百咏》一卷、《南海百咏续编》四卷、《纪文达公遗集》三十二卷、《知足斋诗文集》三十二卷、《唐骈体文钞》十七卷等。另外,学海堂还据殿本重刊了《通典》二百卷、《续通典》一百四十四卷、《皇朝通典》一百卷。同治七年广东书局重刻的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二百卷与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二十卷用的也是学海堂藏版。由于有以陈澧等人为代表的东塾学派的学术支撑,这些书籍校勘较为精审,版式古雅,受到读者的欢迎。阮元及学海堂对学术、刻书的提倡之功是巨大的,其影响也较为深远。到了光绪年间,两广总督张之洞继阮元之遗风,也以文化建设为己任。他设广雅书院,选两广学生各一百名入学。同时建广雅书局,专司刻印书籍。广雅书局规模宏大,有东、西、南、北、前、后六校书堂。同时也制定了严密的刻书章程:有提调,专司雕刻印刷诸事;有总校,提挈文字校勘事宜;其下设分校多人。每雕印一书,卷末必署明某人初校,某人复校,某人总校,以明确责任。许多在朴学上卓有成就的学者被聘请到书局中任职,如任提调的王秉恩,任校勘的廖泽群、屠敬山、陶浚寅、王仁俊、叶昌炽、缪荃孙等人。一流的编辑校勘队伍保证了广雅书局的刻书质量,其刻印的书籍有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》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《全唐文》

《广雅丛书》《纪事本末汇刻》《廿二史札记》等300余种。在晚清的二十余年中,其刻书数量位居众书局之首。广雅书局的刻书特色在于注重史部书的刻印,所刻书籍往往卷帙浩繁,切于实用。广东书局,也称粤东书局、羊城书局,也是较为重要的官办刻书机构,其刻书活动主要集中于同治年间。所刻以《通志堂经解》一千七百九十二卷最为知名,另外还有《十三经注疏附考证》三百四十七卷、《牧令全书》二十三卷、《古经解汇函》一百三十卷、《小学汇函》一百五十三卷等。除了这些专门的官办刻书机构,一些官府衙门也参与了刻书活动,如嘉庆二十四年两广节署刊本的《有竹居集》十六卷、道光十五年广州财政司刊本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二十四卷等。官刻以其财力雄厚、组织性强的特点成为古代刻书活动的主力之一,广东官刻在热心文化事业的官员的支持下,取得了不俗的成绩,在清代中后期的官刻事业中也占有一席之地。

私刻是这一时期广东刻书中成就最大的部分,涌现出了许多有名的刻书家。其或以学问知名,或以仕宦闻达,或以豪富著称,但都雅好学问,热心刻书,可见一个地区的文化积淀对于刻书事业的巨大影响。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伍崇曜、潘仕成、孔广陶、陶福祥、陈焯之、简朝亮、冯焄光、康有为、陈澧等。以上所列只是当时私刻的代表人物,此外还有林伯桐、李光廷、梁廷楠、吴兰修、张维屏、黄培芳、朱次琦、梁九图、温汝能、叶梦龙、陈县、易其需、梁善长、湛祖贵、曾钊、罗学鹏、沈宗畸、邬启祚、阮榕龄、汪琮、吴荣光、汪兆镛、刘晚荣、方功惠等人。

随着刻书风气的影响及文化、教育发展所带来的市场需求扩大,商业化运作的坊刻也发展了起来,成为当时广东刻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坊刻的地理分布与当时各地的商业经济发展联系紧密。广州城作为广东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,也是刻书风气和书籍市场需求最大的地区,分布着许多重要的书坊。当时广州城的书坊多分布于双门底(今北京路北段)、西湖街(今西湖路)、学院前(今教育路南段至书坊街)、龙藏街、十六甫、十八甫一带,其中重要的有富文斋、翰墨园、五桂堂、萃文堂、留香斋等。此外还有厂广山房、六书斋、太清楼、正文堂、宝珍楼、经韵楼、翰元楼、儒雅堂等等,数量极多,颇显当时广州坊刻之盛。

### 三、广东其他地区的刻书

除了广州城以外,其他地区的刻书也取得了一些成就。

在广州发达的刻书业的带动下,广州周边的一些地区的刻书

也得到了发展。当时的顺德县马岗村就是著名的刻书专业化基地。从乾隆年间开始,村中便几乎人人参与刻书活动,男子依墨迹刻画界线,刻字工序则由女子完成。因其刻工精良而价格低廉,苏州商人往往携书到此刻板,然后将书版带回苏州印刷,以冒充素享美名的苏版,由此亦可见其质量之高。顺德刻书在此背景下也兴盛了起来,其成绩主要集中在私刻与坊刻,计有龙凤龕(知服斋)所刻《知服斋丛书》二十五种、《螺书山房丛书》四十五卷,敝帚斋所刻《敝帚斋诗文钞》六卷,龙氏葆真堂所刻《拙庵丛稿》二十卷、《无邪堂答问》五卷、《佩弦斋文存》二卷附四卷等。

佛山镇是明清时期广东地区著名的商业中心,经济繁荣,人口众多,名列天下“四大聚”和四大名镇之一。佛山刻书主要是坊刻,计有翰文堂、英文堂、文华书局、近文堂、芹香阁等书坊 76 家,其刻印书籍以科举制义、日用百科和通俗文艺为主。佛山书坊专业化程度不高,多附设于纸行、文具店、书店等。但其商业化程度高,其刻印书籍非常贴近市场需求。

潮州也是清代广东刻书的一个重要地区。潮州刻书历史悠久,这得益于其良好的文化积淀。明代潮州刻书兴盛,清代则接其遗绪,公私刻书不断。潮州刻书以私刻为主要者,名刻家首推丁日昌。其家富于藏书,也曾以“百兰山馆”为名刻书,其所刻《荔枝唱和册》,字体、版式皆精良。冯奉初所刻《潮州耆旧集》二十卷,世称善本。郑昌时刻其自著之《韩江闻见录》十卷。海阳韩氏刻的《尔雅郭注补正》也是较有名的刊本。潮州坊刻也较为繁荣。谢存文馆与王存文楼合刻有《海阳县志》。此外,王存文楼还独刻《林氏重修族谱》十四卷,吴瑞文堂刊有《对汇会海》,林文堂刊有《增订十五音》六卷,叶氏爱菊草堂刊有《历代帝王歌》等。民国时期潮州刻书的杰出代表郑尧臣刻《龙溪精舍丛书》正是在这一时期刻书业发展的基础上诞生的。

惠州地区在明代涌现了杨起元、张萱等学者,文风颇盛,其中张萱更是以藏书丰富闻名。清代的惠州刻书有文昌宫刻《惠州府志》四十五卷、同和堂刻《永安县志》五卷等。

高州刻书在清代也得到了发展,计有三德堂所刻《信宜县志》八卷拾遗一卷、富文楼刻《高州府志》五十四卷、李氏橘香居刻《宝山橘话》一卷、高城联经号所刊《高凉耆旧遗集》等。

琼州虽地处海岛,但经过明代的开发和文化发展,到清代

时已无复昔日蛮荒之感。其刻书有邱氏可继堂《邱海二公合集》十六卷、宝勒楼《文公家礼仪节》八卷、云志高蓼怀草堂《蓼怀堂琴谱》等。

肇庆的端溪书院是清代广东境内历史较为悠久,规模较大的一座官办书院。其附设有刻书局进行刻书,刻有《端溪丛书》20 种,包括《墨子刊误》《孟子字义疏证》等清人著述。

综上所述,清代的广东刻书在丰厚的经济、文化积累的基础上迎来了一个“爆发期”。无论在刻书数量,还是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。到清代中后期,广州已经成为与北京、苏州、上海并列的刻书业重镇。除了广州以外,广东其他地区的刻书也得到了发展,对当时各地的文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#### 参考文献:

- [1] 方人疋. 广东板刻纪事 [J]. 广州: 广东图书馆学刊, 1982.
- [2] 沈娜. 古代广东雕版印刷刻书风格述略 [J]. 广州: 广东印刷, 2006.
- [3] 罗志欢. 明清广东刻书质量考述 [J]. 北京: 文献, 2006.
- [4] 李绪柏. 清代广东所刻丛书初探 [J]. 广州: 中山大学学报, 1992.
- [5] 卢银兰. 清代广东医书出版状况初探—基于目录及广州市馆藏书版的考察 [D]. 广州: 广州中医药大学, 2007.
- [6] 张淑琼. 清代广州海幢寺经坊刻书及藏版述略 [J]. 广州: 岭南文史, 2012.
- [7] 屈大钧. 广东新语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5.
- [8] 陈献章. 陈献章集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7.
- [9] 罗焕好、徐泳. 阮元与学海堂及其刻书 [M]. 广州: 广东史志, 2003.
- [10] 张磊. 张之洞与广雅书局 [J]. 北京: 图书馆情报工作, 2004.
- [11] 罗志欢. 清代广东部分书坊及私刻书简述 [J]. 广州: 图书馆论坛, 1993 (3).
- [12] 刘淑萍. 佛山坊刻出版商的商业活动探析 [J]. 佛山: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, 2012.
- [13] 陈香白. 潮州刻书述评 [J]. 汕头: 汕头大学学报, 1990.
- [14] 王献军. 端溪书院史话 [J]. 广州: 广东史志, 2002.